

香港文學大系

導言集

陳國球 陳智德 等著

香港文學大系

導言集

陳國球 陳智德 等著

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導言集

作者 陳智德 樊善標 危令敦 謝曉虹

黃念欣 盧偉力 陳國球 林曼叔

程中山 黃仲鳴 霍玉英

責任編輯 洪子平

封面設計 張毅

出版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滙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印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次 201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16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 962 07 4544 7

版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其他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人員名單

編輯委員會

總主編 陳國球

副總主編 陳智德

編輯委員 危令敦 陳國球 陳智德 黃子平

黃仲鳴 樊善標（按姓氏筆畫序）

顧問

王德威 李歐梵 許子東 陳平原

黃子平（按姓氏筆畫序）

各卷主編

- | | | |
|----|-------|-----|
| 1 | 新詩卷 | 陳智德 |
| 2 | 散文卷一 | 樊善標 |
| 3 | 散文卷二 | 危令敦 |
| 4 | 小說卷一 | 謝曉虹 |
| 5 | 小說卷二 | 黃念欣 |
| 6 | 戲劇卷 | 盧偉力 |
| 7 | 評論卷一 | 陳國球 |
| 8 | 評論卷二 | 林曼叔 |
| 9 | 舊體文學卷 | 程中山 |
| 10 | 通俗文學卷 | 黃仲鳴 |
| 11 | 兒童文學卷 | 霍玉英 |
| 12 | 文學史料卷 | 陳智德 |

前言

《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的籌劃階段，始於二〇〇九年；到二〇一四年七月陸續出版，二〇一六年三月全輯十二卷出齊；其間經歷七年的光陰。《大系》編纂過程之艱辛，不足為外人道。可以說明的是：編輯團隊中人，都抱持對歷史負責的態度，盡能力重拾我城已被遺忘的文化光影於破瓦頹垣之間。

有人說：香港是「記憶」無可存有的城市。這種「無可」，究竟是外來宰制力量使然，還是自行蔑棄擠斥所致，實在毋庸稽查檢覈。然而過去三十年來，已有前輩辛勤造磚鋪路，為重尋往昔打開通道。我們編纂《大系》也是在前輩先導的基礎上，再作接力，讓本屬香港人可以集體擁有的文化記憶的重要部分，回到我們身邊。

《香港文學大系》十二卷以體裁分類，包括：新詩一卷（主編陳智德）、散文兩卷（主編樊善標、危令敦）、小說兩卷（主編謝曉虹、黃念欣）、戲劇一卷（主編盧偉力）、評論兩卷（主編陳國球、林曼叔）、舊體文學一卷（主編程中山）、通俗文學一卷（主編黃仲鳴）、兒童文學一卷（主編霍玉英）、文學史料一卷（主編陳智德）。編輯條例訂明，各卷主編除了搜羅編選整理該體裁之文本成冊以外，並就觀察所得，撰寫本卷〈導言〉，析述香港文學的相關發展與特色。總主編又從比較寬闊的角度，交代《香港文學大系》的源起、編選理念，以至編輯範圍等。這個編輯框架和體

式，主要參考一九三五年至三六年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由趙家璧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我們認為《中國新文學大系》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書寫基礎；我們也期待《香港文學大系》的編成，有助日後香港文學史的撰述。

《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總序〉和〈導言〉由蔡元培、胡適、鄭振鐸、魯迅、茅盾、鄭伯奇、朱自清、周作人、郁達夫、洪深等大家名家撰寫；至一九四〇年良友圖書公司再把各集〈導言〉合成《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出版，學界稱便。我們也仿照此例，請各卷主編就各卷〈導言〉修訂刊誤，加上適當標題，集合為《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導言集》，仍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讀者手此一編，可以縱覽一九四九年以前香港文學在不同領域中的演化痕跡，又可以從各卷主編申述編輯宗旨與取捨之由，參酌香港文學史書寫種種可能與不能。至方家指瑕匡謬，多予教正，我們更是熱切期盼中。

陳國球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於八仙嶺下

目錄

前言

iii

香港？香港文學？

《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總序／陳國球

1

時代思潮與早期香港新詩

《新詩卷》導言／陳智德

41

香港散文的生產與變遷：一九二〇年代至一九四一

《散文卷一》導言／樊善標

59

戰爭與流離：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九

《散文卷二》導言／危令敦

81

時間游民：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一的香港小說

《小說卷一》導言／謝曉虹

107

香港文學風景論：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九

《小說卷二》導言／黃念欣

145

香港現代戲劇生長的時代機遇與文化土壤

《戲劇卷》導言／盧偉力

169

文學評論與「畸形香港」的文化空間

《評論卷一》導言／陳國球

201

作家南來重建香港文壇 左翼文藝陣地風起雲湧

《評論卷二》導言／林曼叔

249

居夷風雅參時變：論百年香港舊體文學之發展

《舊體文學卷》導言／程中山

277

拒絕遺忘：極具特色的香港通俗文學

《通俗文學卷》導言／黃仲鳴

317

兩種取向：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九的香港兒童文學

《兒童文學卷》導言／霍玉英

341

文學史料的本質與早期香港文學源流

《文學史料卷》導言／陳智德

369

香港？香港文學？

陳國球

——《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總序

香港文學未有一本從本地觀點與角度撰寫的文學史，是說膩了的老話，也是一個事實。早期幾種境外出版的香港文學史，疏誤實在太多，香港文藝界乃有先整理組織有關香港文學的資料，然後再為香港文學修史的想法。由於上世紀三〇年代面世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被認為是後來「新文學史」書寫的重要依據，於是主張編纂香港文學大系的聲音，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不絕於耳。這個構想在差不多三十年後，首度落實為十二卷的《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際此，有關「文學大系」如何牽動「文學史」的意義，值得我們回顧省思。

一、「文學大系」作為文體類型

在中國，以「大系」之名作書題，最早可能就是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出版，由趙家璧主編，蔡元培總序，胡適、魯迅、茅盾、朱自清、周作人、郁達夫等任各集編輯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大系」這個書業用語源自日本，指匯聚特定領域之相關文獻成編以為概覽的出版物：「大」指此

一出版物之規模；「系」指以「時」聯系或以「體」聯系。²趙家璧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出版五十年後的回憶文章，就提到他以「大系」為題是師法日本；他以為這兩字：

既表示選稿範圍、出版規模、動員人力之「大」，而整套書的內容規劃，又是一個有「系統」的整體，是按一個具體的編輯意圖有意識地進行組稿而完成的，與一般把許多單行本雜湊在一起的叢書文庫等有顯著的區別。³

《中國新文學大系》出版以後，在不同時空的華文疆域都有類似的製作，並依循着近似的結構方式組織各種文學創作、評論以至相關史料等文本，漸漸被體認為一種具有國家或地域文學史意義的文體類型。⁴資料顯示，在中國內地出版的繼作有：

▼ 丁景唐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四—一九八九）；

▼ 孫顯、江曾培等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三七—一九四九》（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〇）；

▼ 馮牧、王蒙等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七）；

▼ 王蒙、王元化總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七六—二〇〇〇》（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九）。

另外也有在香港出版的：

▼常君實、譚秀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一九二八—一九三八》（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一九六八）。

在臺灣則有：

▼余光中等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大系》（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台北：巨人出版社，一九七二）；

▼司徒衛等主編：《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台北：天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七九—一九八一）；

▼余光中總編輯：《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臺灣一九七〇—一九八九》（台北：九歌出版社，一九八九）；

▼余光中總編輯：《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貳）——臺灣一九八九—二〇〇三》（台北：九歌出版社，二〇〇三）。

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地區有：

▼方修編：《馬華新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二）（新加坡：世界書局／香港：世界出版社，一九七〇—一九七二）；

▼方修編：《馬華新文學大系（戰後）》（一九四五—一九七六）（新加坡：世界書局，一九七九—一九八三）；

▼李廷輝等編：《新馬華文文學大系》（一九四五—一九六五）（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一九七一)；

▼雲里風、戴小華總編輯：《馬華文學大系》(一九六五—一九九六)(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二〇〇四)。

內地還陸續支持出版過：

▼方修編：《戰後新馬文學大系》(一九四五—一九七六)(北京：華藝出版社，一九九九—二〇〇一)；

▼新加坡文藝協會編：《新加坡當代華文文學大系》(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一九九一)；

▼于華、馬文蔚等主編：《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大系》(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一九九三)等。

其他以「大系」名目出版的各種主題的文學叢書，形形色色還有許多，當中編輯宗旨及結構模式不少已經偏離《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傳統，於此不必細論。

1 「文學大系」的原型

由於趙家璧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正是「文學大系」編纂方式的原型，其構思如何自無而有，如何具體成形，以至其文化功能如何發揮，都值得我們追跡尋索，思考這類型的文化工程的

意義。在時機上，我們今天進行追索比較有利，因為主要當事人趙家璧，在一九八〇年代陸續發表回顧編輯生涯的文章，尤其文長萬字的〈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除了個人回憶，還多方徵引紀錄文獻和相關人物的記述，對《新文學大系》由編纂到出版的過程有相當清晰的敘述。⁵後來不少研究者如劉禾、徐鵬緒及李廣等，討論《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輯過程時，幾乎都不出《編輯舊》一書所載。⁶在此我們不必再費詞重複，而只揭其重點。

首先我們注意到作為良友圖書公司一個年輕編輯，趙家璧有編「成套文學書」的事業理想；同時，身為商業機構的僱員，他當然要照顧出版社的成本效益、當時的版權法例，以至政治審查等種種限制。⁷從政治及文化傾向而言，趙家璧比較支持左翼思想，對國民政府正在推行的「新生活運動」，以至提倡尊孔讀經、重印古書等，不以為然。因此，他想要編集「五四」以來的文學作品成叢書的想法，可說是在運動落潮以後，重新召喚歷史記憶及其反抗精神的嘗試。⁸

在趙家璧構思計劃的初始階段，有兩本書直接起了啟迪作用：阿英（錢杏邨）介紹給他的劉半農編《初期白話詩稿》，以及阿英以筆名「張若英」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前者成了趙家璧「理想中的那本『五四』以來詩集的雛形」，後者引發他思考：「如果沒有『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理論建設，怎麼可能產生如此豐富的各類文學作品呢？」由是，趙家璧心中要鋪陳展現的不僅止是歷史上出現過的文學現象，他更要揭示其間的原因和結果；原來僅限作品採集的「『五四』以來文學名著百種」的想法，變成「請人編選各集，在集後附錄相關史料」的比較立體的構想，再進而落實為「一套包括理論、作品、史料」的「新文學大系」。《史料集》一卷的作用主要是為選入

的作品佈置歷史定位的座標，提供敘事的語境；而「理論」部分，因為鄭振鐸的建議，擴充為《建設理論集》和《文學論爭集》。這兩集被列作《大系》的第一、二集，引領讀者走進一個文學史敘事體的閱讀框架：新文學好比這個敘事體中的英雄，其誕生、成長，以至抗衡、挑戰，甚而擊潰其他文學「惡」勢力（包括「舊體文學」、「鴛鴦蝴蝶文學」等）的故事輪廓就被勾勒出來。其餘各集的長篇〈導言〉，從不同角度作出點染着色，讓置身這個「歷史圖象」的各體文學作品，成為充實「寫真」的具體細部。

《中國新文學大系》的主體當然是其中的《小說集》、《散文集》、《新詩集》和《戲劇集》等七卷。劉禾對《大系》作了一個非常矚目的判斷；她認定它「是一個自我殖民的規劃」（“self-colonizing project”），證據之一是《大系》按照「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的文類形式四分法（“four-way division of generic forms”）組織「所有文學作品」，而這四種文類形式是英語的“fiction”，“poetry”，“drama”，“familiar prose”的對應翻譯，《大系》把這種西方文學形式的「『翻譯』的基準」（“‘translated’ norms”）典律化，使自梁啟超以來顛覆古典文學之經典地位的想法得成具體（crystallized）。所謂「自我殖民化」的意思是，趙家璧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視西方為「中國文學」意義最終解釋的根據地。⁹ 衡之於當時的歷史狀況，劉禾這個論斷應該是一種非常過度的詮釋。首先西方的文學論述傳統似乎沒有以「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的四分法來統領「所有文學作品」。¹⁰ 而現代中國的「文學概論」式的文類四分法可說是一種糅合中西文學觀的混雜體；其構成基礎還是中國傳統的「詩文」分類，再加上受西方文學傳統影響而致「文學位階」得以提升的「小

說」與「戲劇」，統合成文學的四種類型。這四種文體類型的傳播已久；翻查《民國時期總書目》，我們可以看到以這些文類概念作為編選範圍的現代文學選本，在《大系》出版以前或約略同時，就有不少，例如《新詩集》（一九二〇）、《近代戲劇集》（一九三〇）、《當代小說讀本》（一九三二）、《現代中國戲劇選》（一九三三）、《現代中國詩歌選》（一九三三）、《短篇小說選》（一九三四）等等。¹¹趙家璧的回憶文章提到，他當時考慮過的「文類」是：「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散文」、「詩」、「戲劇」、「理論文章」，¹²而不是四分文類的定型思考。因此，這種文類觀念的通行，不應該由趙家璧或《中國新文學大系》負責。事實上後來出現的「文學大系」亦沒有被趙家璧的先例所限囿，例如：《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增加了「報告文學」和「電影」；《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三七—一九四九》的小說類再細分「短篇」、「中篇」和「長篇」，又另闢「雜文」集；《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七六—二〇〇〇》的小說類除長、中、短篇以外，增設「微型」一項，又調整和增補了「紀實文學」、「兒童文學」、「影視文學」。可見「四分法」未能賅括所有中國現代文學的文類。

劉禾指《中國新文學大系》「自我殖民」——完全依照西方標準（而不是中國傳統文學的典範）來斷定「文學」的內涵——更是一種「污名化」的詮釋。如果採用同樣欠缺同情關懷的批判方式，我們也可以指摘那些拒絕參照西方知識架構的文化人為「自甘被舊傳統宰制的原教主義信徒」。無論是哪一種方向的「污名化」，都不值得鼓勵，尤其在已有一定歷史距離的今天作學術討論時。近代以來中國知識份子面對西潮無所不至的衝擊，其間危機感帶來的焦慮與徬徨，實在是前所未

有。正如朱自清說當時學術界的趨勢，「往往以西方觀念為範圍去選擇中國的問題，姑無論將來是好是壞，這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事實」；¹³在這個關頭，有責任感的知識份子都在思考中國文化「如何應變」、「自何自處」的問題。無論他們採用哪一種內向或者外向的調適策略，都有其歷史意義，需要我們同情地了解。

胡適、朱自清，以至茅盾、鄭振鐸、魯迅、周作人，或者鄭伯奇、阿英，這些《中國新文學大系》各卷的編者，各懷信仰，尤其對於中國未來的設想，取徑更千差萬別；但在進行編選工作時，其相同的思路還是明顯的——就是為歷史作證。從各集的〈導言〉可見，其關懷的歷史時段長短不一；有只駐目於關鍵的「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如鄭振鐸的《文學論爭集·導言》，或者朱自清的《詩集·導言》；也有由今及古、上溯文體淵源，再探中西同異者，如郁達夫的《散文二集·導言》。¹⁴當然，其中歷史視野最為宏闊的是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所寫的〈總序〉。〈總序〉以「歐洲近代文化，都從復興時代演出」開篇，將「新文學運動」比附為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此時中國以白話取代文言為文學的工具，好比「復興時代」歐洲各民族以方言而非拉丁文創作文學。蔡元培在文章結束時說，「歐洲的復興」歷三百年，「我國的復興，自五四運動以來不過十五年」：

新文學的成績，當然不敢自詡為成熟。其影響於科學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現個性的藝術，均尚在進行中。但是吾國歷史，現代環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軼絕塵的猛進。吾人自期，至少應以十年的工作抵歐洲各國的百年。所以對於第一個十年先作一總審查，使吾人有

以鑑既往而策將來，希望第二個十年與第三個十年時，有中國的拉飛爾與中國的莎士比亞等應運而生呵！¹⁵

我們知道自晚清到民國，歐洲歷史上的“Renaissance”是一個重要的象徵符號，是許多文化人的迷思；然而這個符號在中國的喻指卻是多變的。有比較重視歐洲在中世紀以後追慕希臘羅馬古典著述之「古學復興」的意義，認為偏重經籍整理的清代學術與之相似；也有注意到十字軍東征為歐洲帶來外地文化的影響，謂清中葉以後西學傳入開展了中國的「文藝復興」；又有從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以民族語言創作文學而產生輝煌的作品着眼，這就是自一九一七年開始的「文學革命」的宣傳重點。¹⁶蔡元培的〈總序〉也是這種論述的呼應，但結合了他對中西文化發展的觀察，使得「新文學」與「尚在進行中」的「科學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現個性的藝術」等變革相互關聯，從而為閱讀《大系》中各個獨立文本的讀者提供了詮釋其間文化政治的指南針。¹⁷

《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結構模型——賦予文化史意義的「總序」、從理論與思潮搭建的框架、主要文類的文本選擇，經緯交織的導言，加上史料索引作為鋪墊——算不上緊密，但能互相扣連，又留有一定的詮釋空間，反而有可能勝過表面上更周密，純粹以敘述手段完成的傳統文學史書寫，更能彰顯歷史意義的深度。